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4.3

4 issues a year in 13 languages

社会学作为志业

Zsuzsa Ferge,
Melvin Kohn

第18届ISA世界大会

Margaret Abraham,
Vladimir Ilin,
Michael Burawoy

外包的自我

Arlie Hochschild
interviewed by Madalena
d'Oliveira-Martins,
Amrita Pande and
Ditte Maria Bjerg

法国社会学

Bruno Cousin and
Didier Demazière,
Christine Musselin,
Frédéric Lebaron,
Frédéric Neyrat,
Romain Pudal

- > 社会学和环境变迁
- > 秘鲁的采矿的原住民
- > 国际化下的捷克社会学
- > 岌岌可危的捷克社会学
- > 阿拉伯团队

NEWSLETTER



VOLUME 4 / ISSUE 3 / SEPTEMBER 2014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编的话

不断进步的ISA

这个夏天 ISA 在横滨举办了第 18 届世界社会学大会 (7/13-19)，由日本在地委员会和 ISA 秘书处共同筹办。总共有 6087 人注册参与，创下历史纪录。总共有 1100 个场次。这也让这期的全球对话刊出了俄罗斯社会学家 Vladimir Ilin 的想法：ISA 是不是太大了。而这此也选出了新的执委会和会长 Margaret Abraham。这期的全球对话刊出了她对于社会学贡献社会正义的热情期待。

这期我们刊登了 5 篇关于法国社会学的文章，强调了其对法国公共领域和政策的贡献。同时作者们也讨论学术的官僚化、专门化，以其同侪审查的专业化，和出版英文文章的压力。捷克则有着大不相同的状况，因为处于半边陲的捷克仍想要努力向核心迈进。

一开头则是介绍了两位有名的社会学家如何把社会学当作志业。Zsuzsa Ferge 从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历史的脉络检视其生涯，并从穷人和边缘人的立场回顾这一切。而 Melvin Kohn 则描述了其先驱跨国研究的，聚焦在个性和结构。另外也访问了 Arlie Hochschild，其情绪劳动和感觉商品化的概念影响深远。Amrita Pande 和 Ditte Bjerg 则分析代理孕母的展演，这是 Pande 在印度进行的研究。从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公共社会学的新形式。

我是在瑞典写这篇文章的。而此时正值北欧社会学会举办双年会。年轻社会学家在 Lund 聚会，讨论北欧的福利体系和移民对此的影响。北欧国家中，特别是瑞典，接受了许多战乱国的移民，但其福利、教育、工作的被歧视仍然存在。人道主义的空隙中，总是有社会学家的影子！



Zsuzsa Ferge 是匈牙利著名的政策分析与批判家，回忆其当初如何对于经济学无法解释社会不平等的失望而转向社会学的经过。



Melvin Kohn 是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描述如何透过社会结构和个性的研究串起了跨国合作的机会。



Margaret Abraham 是新任的 ISA 会长，描述社会学怎么和社会正义结合，并聚焦在性别暴力上。



全球对话由

SAGE Publications 赞助。

全球对话以 13 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http://isa-website.org)。

投稿请寄给 burawoy@berkeley.edu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Gay Seidman.

副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Benno Alves.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Ritu Saraswat, Nidhi Bansal,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ajmeh Taheri, Saghar Bozorgi, Hamidreza Rafatnejad, Abdolkarim Bastani, Tara Asgari Laleh, Faezeh Khajezadeh.

波兰: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la, Kamil Lipiński, Przemysław Marcow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Adam Mü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Zofia Penza.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Surdu, Telegdy Balazs,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Miriam Cihodariu, Mihai Bogdan Marian, Alina Stan,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ş.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经懋

土耳其:

Yonca Odabas, Günnur Ertong Attar, İlker Uurlu, Zeynep Tekin Babuç, Hüseyin Odabaş.

媒体顾问: Gustavo Taniguti, José Reguera.

编辑顾问: Ana Villarreal.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不断进步的ISA

2

社會學志業: 转向投入社会学

by Zsuzsa Ferge, 匈牙利

4

社会学志業: 跨国合作的一生

by Melvin L. Kohn, 美国

6

> ISA世界大会

让社会学为社会正义奋斗

by Margaret Abraham, 美国

9

横滨世界大会的回顾

by Vladimir Ilin, 俄國

12

Immanuel Wallerstein獲頒ISA卓越奖

by Michael Burawoy, 美國

15

> 外包的自我

情绪劳动和世界: 访谈Arlie Hochschild

by Madalena d' Oliveira-Martins, 西班牙

16

印度制造: 婴儿农场速写

by Amrita Pande, South Africa and Ditte Maria Bjerg, 丹麦

19

> 今日的法国社会学

21世纪的法国社会学

by Bruno Cousin and Didier Demazière, 法國

22

消失的学术生涯

by Christine Musselin, 法國

24

评价法国的社会学

by Frédéric Lebaron, 法國

26

变迁中的法国社会学专业

by Frédéric Neyrat, 法國

28

为什么法国社会学没有人类受试者规范?

by Romain Pudal, 法國

30

> 面对环境议题

社会学在那? 环境变迁和社会科学

by Stewart Lockie, 澳洲

32

铜、水、土地: 秘鲁 Piedra Alta的矿业

by Sandra Portocarrero, 秘魯

35

> 捷克社會學的挑戰

国际化和审查文化

by Martin Hájek, 捷克

37

捷克社会学的危机

by Filip Vostal, 捷克

39

阿拉伯团队

by Mounir Saidani, 突尼西亚

41

社会学作为志业： 转向投入社会学家

by Zsuzsa Ferge,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匈牙利



Zsuzsa Ferge.

我 为了生活而成为了社会统计专家，那时 1950 年代，我在念经济学。我被分派到负责分析家户预算的工作。其工作包括了拜访全国的家庭，然后计算每个家庭每月所得，食物开销、买个小孩的用品。这个工作比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等，有趣多了。所以我离开经济，转向更贴近人民和社会的工作。

后来我开始分析家庭数据，并发现那些统计数据可以让大众不要被意识形态所绑架，也不要那么政治化所有的事情，放下成见看待不平等。当时的统计局长很心胸开阔，核准了一项在 1956 年之后的大型调查计划 (20000 户)，探讨阶层化。这个字在政治上的象征性很大，所谓的阶层化是个具有正当性的称呼，而社会阶级则否。我们可以研究低收入户但不要触及使用贫穷等字眼。社会统计可以有正当性，可是社会学要到 60 年代才有。

社会阶层的报告中有各种社经群体的特征，并描述了低收入户者。一个隐微的图像是权力、知识、产权等不平等分配成为了这些群体化分的基础。

社会不平等仍然是任何事情的核心。在配对了许多统计事实，许多问题就浮现了。从一开始我的主要问题是怎么降低不平等，特别是从小孩一出生开始。后来在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的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了 (1963)，我们认为教育是一个可能的机制能让不平等降低。这个研究和之前得很相关，也深深被当时的 Pierre Bourdieu

Zsuzsa Ferge 是匈牙利著名的统计社会学家。不论是在国家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Ferge 总是可以致力于不平等、贫穷、边缘化等研究，出版了超过 15 本书，上百篇文章。作为匈牙利的著名知识分子，她也总是保持批判性，并贡献社会政策。其成立的第一个社会政策系是于 1989 年在 Budapest 的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ELTE)。直到 2011 年解散为止，她带领整个 National Program against Child Poverty 团队做研究，这个团队位于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此外，她也被许多奖项所肯定，更包括多个国家大学的荣誉学位。

等的时代精神所影响。在欧洲，社会科学家希望教育可以帮助减少不平等。因此，从60年代晚期，我们的研究包括了各级学校，学生表现、生涯等，甚至还有教师的情况和意见。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预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显示了虽然学校结构改变了，学要仍然继续是不平等再生产的主要机制。

我们的问题还是一致的：有任何改变社会潮流的能动性吗？而下一个研究的对象就是国家，或是更精确的说，国家行动对于不平等的结构性改变，特别是政策和重分配。所以从1970年早期，我们就开始探索匈牙利社会政策。1966年，我有幸参加了ISA的世界大会，我遇到了后来贫穷、福利、政策委员会的成员Herbert Gans, Peter Townsend, Henning Friis, S.M. Miller等人，这些友谊后来开起了一个通往世界研究不平等、贫穷的大门。

后来我们继续研究贫穷的结构变迁，然后开始检视社会政策。结合社会学的结构视角和社会政策研究，我们构想出了社会性政策(societal policy)的概念，把社会政策研究结构到更大的结构变迁分析之中。1985年，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的社会系支持下，我们创立了社会政策的学位。实际上这是在历史社会学下，因为社会政策不具正当性。

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系在1989年成立，就在政权转型的前夕。在新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结构同样存在，但是重要性改变了。财产权和权力变成了最重要的，知识的重要性降低了，劳动力市场（工作机会、工作稳定、工作危险）成为了结构性力量。我试着用Bourdieu的社会资本概念纳入我的结构变迁理论之中，不过不太成功。但是社会和个人的连结似乎越来越重要，这或许不只有在现今的匈牙利才这样。不平等、贫穷、特别是儿童贫穷，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大大增加了。

我退休之后仍持续研究儿童贫穷，然后和我的同事一起组织了National Program

to Combat Child Poverty 2007-2032。这个计划是2008年中由匈牙利国会所实行，并执行了许多区域的对抗贫穷计划，一直到2011年解散才终止。一个比较中间的计划后来存活了下来，不过那计划忽略了政策的辩论。从2010年开始，政府已经有反贫穷和支持中产阶级的偏见立场，并且反儿童福利。进步的税收被均一税率、社会援助等取代，犯罪负责年龄从14岁降到了12岁。强迫就学从18岁降到16岁。

所以，虽然我批判国家社会主义（或要说共产主义也好）的不平等，我已经继续用启蒙的理念批判当前的社会。而当之前的政权瓦解之后，我们也才了解到之前的社会是相对较为平等的。而什么是收入财富减少的代价、延伸、长期、短期的影响呢？而知识的不平等呢？若不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会很难去解释自从政治经济转型后的变化为何。

最近几十年代我已经试着结合研究、教学、田野到所谓的公民社会之中。我越来越相信若没有强健的公民社会，国家和市场会不受拘束。这个信念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只要看看匈牙利的公民社会就知道，孱弱的社会是无法约束国家和市场的。■

来信寄给：Zsuzsa Ferge <fergesp@t-online.hu>

> 跨国合作的一生

by Melvin L. Koh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美国, ISA执行委员(1982-1990)



Melvin Kohn.

6

Melvin Kohn 是研究社会结构和个性的先驱，最有名的作品是 *Class and Conformity* (1969, 1977 再版)。这本书分析了阶级如何和个性相关。他从调查资料着手这个棘手的题目，分线了工作自主（不被控制、任务复杂、工作多元）和自我导向的高度相关。相反地，那些包括例行性、高度劳力、单调工作的职业容易让人的行为较为服从。他也发现了另外一种因果关系，也就是较为自我导向的个性比较可以找到类似这种性格的工作且胜任之。个性影响了许多生活的面向，不只教育孩子，还包括了代间行为的传递。为了测试这个关系有多么可靠，Kohn 大

力提倡跨国比较，特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那些历经巨大社会变迁的国家。他的其他书籍和文章也都是和这个主题相关。Kohn 已经相当有名，是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的院士，也是美国社会学会的会长。后来也是 ISA 的热情支持者，并成为执行委员（1982-1990），影响力很大。

>>

在60多年之后，我身为一位经验社会学家，我想我和其他人最不同的地方在于，我非常投入团队研究，特别是在后来的40年里面，我成为了跨国主义者。这很简单，因为我很喜欢从理论导出经验问题，特别是跨国的普遍性。在美国的许多发现也适用在欧洲吗？若是如此，那在共产国家呢？若在苏联是，那在中国呢？其他国家文化呢？但我只会讲英文和一点德文，那该怎么办？那就是找双语的合作者。

这一切发生得很偶然。在Maryland的一位博士后研究延伸了个性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到Washington, D. C.。我的同事Carmi Schooler认为应该要把这个研究延伸到美国的各行各业里面。这是我第一次的合作，相当兴奋。两个人的兴趣互补得很好。

但是那不是跨国比较。我第一次尝试是和意大利TorinoLeonard Pearlman, 比较我在Washington DC的研究。这不是真正的合作研究。虽然在一个很重要的点：父母的社会阶级和父母对于自我导向的评价上我们有合作，可是不是跨国的。

事情后来有了突飞猛进的点。Włodzisław Wesolowski是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他邀请我去几场演讲。我很高兴的应约了，非常喜欢这种方式。Wesolowski后来希望可以在波兰测试我的理论。波兰的部份属于他们自己，他们有资料、资金、人力，其徒弟Kazimierz (Maciek) Słomczyński跑模型，然后我是「技术咨询员」。

这样的合作便得一发不可收拾。Maciek和我后来密切合作发展跨文化比较的方式，特别是概念的意义和测量，把国内的模型可以延伸到同时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使用严格的方法。特别是波兰团队的帮忙，他们致力于这项合作研究，让人非常欣慰。

两本书和几篇文章因此产生了，我指出了有力的证据，发现虽然社会结构和个性在美国和波兰是很不同的类别，但是却是相关。两个国家都显示了高阶级和高地位的人有较高知识弹性，更自我导向，而且很在意幸福。这些人的工作更为复杂，比较少受到控制，不从事很例行化的任务。

同时，很幸运地，Ken'ichi Tominaga

和Atsushi Naoi把日本带了进来。而事实上是比较美国、波兰、日本。我们发现跨国的相似行非常大，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和波兰的低技术工人的痛苦程度。日本则是在中间。

但是，当Maciek和我们发现波兰人民挑战威权主义时，我们问了一个新的问题：巨大的社会变迁（例如波兰民主转型和基督教）怎么改变了我们的既有发现呢？Krystyna Janicka, Bogdan Mach, Wojciech Zaborowski等三位波兰学者加入了，我们不仅研究社会结构的情境和个性的关系，也纳入了女性和失业人口。

可是，在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又如何呢？研究东欧一直都很困难，甚至机会很少，所以我都没有尝试。而这个时候我有了个机会去俄国，于是问了俄国的首席社会学家Vladimir Yadov是否愿意合作。他可惜地说这个问题太敏感了（在Gorbachev政权下），不过他引荐了乌克兰的两位学者，一位是理论家Valeriy Khmelko，一位是社会心理学家Vladimir Paniotto。我们在研究设计时，苏联瓦解了，于是这两位学者在乌克兰成立了苏联史上第一个调查研究中心。从那时候开始，持续好几个月，我在Warsaw和Kiev之间来来回回，分别和波兰与乌克兰的团队合作。

从波兰和乌克兰的比较中，我学到了几件事情，特别是发现这两个国家越来越像美国和日本。劳工都很痛苦，也就是资本主义所谓的不变的劳动条件，但是也的确转变了雇主和工人的关系。研究的尾声，发现波兰工人和美国工人其实是一样的，乌克兰则紧追在后。而当波兰团队正要结束研究时，乌克兰才刚要开始。在乌克兰，事情进展的较缓慢，不过数量较多。乌克兰有自己的资金和调查产业，也有了后续研究，不过我只有我自己自私地分析了资料。

乌克兰的后续研究是跨国长期比较的真正延伸。因为我们可以重新访问受访者。我发现了乌克兰非常不稳定的个性，特别是在动荡的3年。这和马利（特别是非洲其他国家）类似，那里Carmi Schooler有很类似的发现。工作和个性的关系仍然是相对稳定，虽然系数减低了。我们的因果模型显示了在特别的社会不稳定情形下，个性对于社会位置的影响较少，但是社会结构仍然有很

>>

强的影响力。

可是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一直很有兴趣。我老婆便鼓励我。后来我们一起到中国，她有阿兹海默症，所以每次对于我讲的东西都感到很新鲜有趣，一直要我一定要去研究中国，即使她没办法看到我的研究成果了。我一直在找适合的研究合作对象，因为我一定会非常倚重这位合作者。所幸我遇到了 Lulu Li 和其徒弟 Weidong Wang。我也找了一位研究生 Yin Yue，成为了真正的研究者。Weidong 是收集资料，不可思议地在五个不同的城市同时收集资料。每个城市有一位教授合作，也和大学的学生合作访问。Yin 则是新手，不过很快的就上手了。

中国的研究和我做过得跨国比较的发现一致，不过原因不同。其他国家中，阶级和工作环境的关系，其工作复杂度、控制、例行等是关键因素。可是中国的工作环境解释力很小。在中国，其中的自我受雇者是偏差值，对他们来说，工作环境和个性没关。为什么？我想，并用我在北京游走的经验，这些人是很边缘的人，真正影响他们的是生活环境的贫穷。这听起来不错，可是谁会听我这个不会中文的人的猜想呢？很幸运地，我的两位合作者提供了数据证明了这点。很久之前，Weidong 加入了一个关于受访者户口的问题，指出了受访者住在城市或是乡村。有一天，Yin 突然匆匆跑进我的研究室，给了我看了一篇文章，是由中国学者 Xiaogang Wu 和著名的美国学者 Donald Treiman 所写的，指出乡村来的移工因为不能脱离户口，所以这些人不能有工作，也能买房子，小孩不能受教育。

这就是我设想的答案，印证了我两位合作者的想法，加入了户口问题，并且找到了这个一篇发表在中国学者不太可能看到的期刊的文章。我的两位合作者和其他国家并没有不同，认真、有想法、严肃、有能力、而且很好合作。■

来信寄给：Melvin Kohn <mel@jhu.edu>

> 让社会学为 社会正义奋斗

by Margaret Abraham, Hofstra University, 美国, ISA会长(2014-2018)



Margaret Abraham是新任的ISA会长，于横滨大会上的演说。Kayo Sawaguchi摄影。

今年夏天7月，6087位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来自95个国家，在日本横滨齐聚一堂，共同参与第18届的社会学世界大会。这次大会相当成功，这要很感谢日本在地筹备委员会的贡献，以及主席 Koichi

Hasegawa。此外也要感谢由 Raquel Sosa 带领 ISA 计划委员会，还有 ISA 副会长 Tina Uys, Robert van Krieken, Jennifer Platt, 以及研究委员会、工作小组、主题小组。特别要感谢的则是执行秘书 Izabela Barlinska。最后是会议管

>>



新任会长Margaret Abraham拿着两把武士刀，象征传递权力，不过她拒绝拿刀砍前任会长Burawoy。Vladimir Ilin摄影。

理小组 Confexo。

更重要的还有 Michael Burawoy 会长。他把这次大会主题定为「面对不平等的世界：全球社会学的挑战」，聚焦在公民社会所面临的不平等，和日益严重的商品化和私有化。我们也对于 Michael 所创设的全球对话及其努力感到由衷的感激。全球对话透过电子媒体的方式把知识跨越国界，对全球的社会学社群贡献良多。

我们现在有个契机去强化社会学和这个全球性组织的韧性，因为有了新的执行委员会的支持，还有副会长 Markus Schulz (研究), Sari Hanafi (国家学会), Vineeta Sinha (出版) and Benjamín Tejerina (财政和成员) 的大力帮助，相信一定可以成功。

我们的组织需要继续对于世界的变迁和动荡

做出回应。不同于以往的是，现在我们面对更复杂的全球化，迫使我们必须推动社会学内部的对话。这个社群是不平等的。此外也要响应社会、经济、政治的挑战，一起合作，把整个 21 世纪的世界扩大。如我所知，ISA 的核心任务不是去解释这个世界，而是去找出方法，让未来更加美好。

作为新任的会长，我想指出几个核心目标。尽管我们已经有很长远的进步，我们必须继续发展 ISA 的全球性。ISA 的第一个组织目标是去代表各地的社会学家，不论思想学派和意识形态。全球北方和西方国家仍然是会员的多数，是研究进程的设定者。这让知识交流有所受限。我希望可以增加 ISA 的会员数量，让我们的组织真正的全球化，代表所有人和所有社会学思想。有了研究委员会和国家学会的帮忙，我们将会

考虑现实的方式去建立制度能力，支持那些没有办法加入全球组织的人。此外，也要增加年轻社会学家的机会，确保我们的活力。这必须要我们可以增加财政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确保更包容的参与和健全的财务状况。这需要会员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最重要的是，ISA 的宣言强调「制度和个人的联系，将是世界的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串连起来。」跨领域的对话是很重要的，对于人文学科更是如此，因为各学科有着细致的区分。我希望我可以拥抱、延伸、重新定义跨领域性。就像我们社会学要不断地质问世界，我们也要积极的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互动。ISA 的会议和工作坊可以从中获益良多，包括了和其他领域的意见领袖互动。我希望可以把合作和交流推展到全世界。

当然，ISA 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学知识的全球拓展」，这意味着将社会世界纳进系统的、批判的分析之中，并使其更美好。若把这个目标局限在学术界，那是过度窄化 ISA 的视野了。我们必须有批判性的分析，但也要有行动和介入，包括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促进社会正义和进步变迁。ISA 应该要致力发展好的社会分析架构，严谨的方法，但也应该致力现实世界问题的解决，包括了屠杀、专制、恐怖主义、排外主义、种族歧视、基本教义、性别不平等、贪腐、环境恶化、社会排除等。作为 ISA 会长，我应该要强调社会学不只要分析，也要为推动社会前进努力。我要让 ISA 可以更为这个目标迈进。

作为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我从全球的女性主义研究社群和运动者身上学到很多，我特别关心性别暴力和歧视，这是世界性的问题。虽然对于女性是个威胁，但是这问题也牵涉到家庭、小区、整个社会。系统性施加于女性的暴力是普世的现象，我计划去开启 ISA 的一个全球的计划，串连世界的学者，大家一起研讨如何解决女性受到压迫歧视的普世问题。

我们不能只从会议和期刊上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并肩努力，把社会议题广为传布出去，将专业的社会学知识化为常民的语言，让老妪能解。我们的电子媒体可以派上极大用途。此外，我也要建立全球性的

社会学知识地图，让更多学者使用电子媒体，让更多复杂的脉络和议题可以被知道。

ISA 是一个要发挥影响力的组织，我们的会员可以带入丰富多元的视野和技巧。我已经构想出了未来的蓝图，现在需要你们每一个人的建设性批判和合作！■

来信寄给：Margaret Abraham <Margaret.Abraham@Hofstra.edu>

> 横滨世界大会

by Vladimir Ilin, State University of St. Petersburg, 俄国



前台：Koichi Hasegawa是日本在地筹备会的会长，受颁奖章表扬其团队的贡献。Kayo Sawaguchi摄影。

ISA 的第 18 届世界大会于 7 月 13-19 日在日本横滨举行。要回顾这次大会不是个讨好的事情。不论谁说了什么，总是会有反对的意见出现。而这次有 6000 人参加，是个超大的会议，我觉得就像瞎子摸象，要讨论其实很难。所以以下只是我非常个人的观点。

聚焦社会不平等

大会的主题是社会不平等及其挑战、以及全球社会学。这是个实时的题目，尽管大家乐观的觉得会很平等，但是事实上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平等。社会学对于社会秩序的断裂越来越敏锐，也有左倾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 Michael Burawoy 是 2010-

>>



后台：日本专业会议组织者、自愿者、执行秘书、Confex。

2014 的会长，然后 Erik Wright 也到了会场。而世界社会学的左转也被来自拉美、亚洲、非洲的扩张社会学家人数所影响，因为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更加动荡，刺激了许多新的批判理论。在 Burawoy 的会长演说中，他要大家注意教宗 Francis 的 2013 选举，这是第一个来自全球南方的教宗，而且关心全球不平等。要听到社会学家引用教宗的 Apostolic Exhortation 是很少见的，这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反资本主义的教廷宣言，其认为金钱应该

替人民服务，而非统治人民。Burawoy 也提到经济学家应该也要注意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Burawoy 开始注意到参加世界大会的成员其实反应了全球物质资源的不平等，还有社会学发展的不平等。虽然全球南方的成员增加了，但是 71% 的参与者来自于全球富裕国家，只有 10% 的从贫穷国家来。不过当 ISA 于 1949 年创立时，其只代表了美国和西欧。现在当然是多元多了。

然而许多人相信民主化社会学的社群也有负面

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不具备系统的专业教育，而且没有机会去参与研究、使用社会学文献。Immanuel Wallerstein 告诉我们第一次大会在 1959 年只有 300 人。几乎所有人都来自于西方国家，参加者都是明星学者。超过 6000 人与会的这次大会绝对不是什么名人俱乐部。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更小的会议规模会比较有效，对于时间和金钱来说都是如此。许多社会学家只窝在小圈圈。

可是我们要怎么改进这个状况呢？这个在民主

>>

化和精英乡愁的两难问题是个新的问题。

公共社会学议程

这次Michael Burawoy卸任了，他透过社群媒体建立了一个全球的社会学社群，也就是所谓的数字世界。他也常常到各地拜访学者，形成了公共社会学的概念。这个概念也不是全世界都买单就是了。Burawoy论证社会学可以跳出学院小圈圈，目标可以更广大的放到全世界。这个视野原本是社会学社群内的权力平衡，把社会学带到西方之外。逐渐的这个概念变成了激进社会学的同义词，让社会学变成促进世界正义的工具。

至于聚焦在社会正义的这个目标，横滨大会做到了。社会家可以积极参与改变是借的概念其实不新。毕竟，古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是要改变社会和科学分析并重。美国社会学一开始也就是要推动

社会改革。Pitirim Sorokin 积极加入1917年的俄国革命，差点失去性命。许多ISA会长也都投身政治；而社会学家Jan Szczepański 和 Alberto Martinelli 成为立法委员。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则是巴西总统。

不同的观点在横滨大会中都被提出来。前会长Piotr Sztompka (2002-6) 是Krakow University的教授，是最著名反对公共社会学的人，认为社会学作为学术领域应该更谨慎、客观，不应该投入社会改造。社会学家应该在图书馆，不该在战场上。他认为社会学加的责任应该是了解社会不平等而非解决不平等。许多社会学家支持改革，是没问题，可是要教化民众，那可不行。社会学的责任是解释社会机制，包括那些产生和再生产不平等的机制。马克思花了大半的时间在图书馆，不是战场。他的成名作是资本

论，不是共产党宣言。

他推动一种一致社会学的概念，可以应用到富裕和贫穷的国家。人们不能有很多种社会学。社会机制和变迁是要具有普世解释效力的，即使现象不一样。社会学研究的比准和评价理论的方式应该一致。显然，并没有谁对谁错。社会学本身就是多元的。■

来信寄给：Vladimir Ilin ivi-2002@vandex.ru

Immanuel Wallerstein

荣获ISA卓越奖

by Michael Burawoy, 前ISA会长(2010-2014), 奖项委员会主席



Immanuel Wallerstein获颁ISA杰出奖。Kayo Sawaguchi摄影。

横滨世界社会学大会由一个新的奖项拉开序幕：社会学研究与实践卓越奖。这个奖项鼓励许多的提名，从许多的杰出候选人之中，由来自执行委员会7人组成的奖项委员会选出Immanuel Wallerstein。

这个奖项委员会从各方面的资料中发现，没有人比Immanuel Wallerstein要对社会科学更有贡献了。他的50年来的著作等身，贡献良多。的确，他是少数的典范代表人物。

在1960年代开始，他分析非洲的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然后处理了更广泛的议题，特别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兴起，其理论架构根植在历史知识之上。1974年开始他写了第一卷的现代世界体系，1980，1989，2011分别出版了续集。他的方法让社会学融入了比较历史分析，把古典对于长期社会变迁的兴趣带了回来。其世界体系的架构持续影响着社会科学，吸引众人的兴趣。

当他重写世界史，其分析反应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其中之一是学科的虚

假划分。他对于社会科学的重建看法可以从Open the Social Sciences看到。这是1995年的Gulbenkian委员会报告。从那时候他就撰写了许多社会科学历史和未来的文章。

Wallerstein不仅仅是一位知识巨人。他也全球社会学的公仆，到世界各地旅行，担任许多重要的组织工作。他是1994-98的ISA会长，开创了世界社会学的窗口，让全球社会学的窗口，让拉丁美洲、非洲、亚洲、中东的学者更有机会参加国际交流。他也启发了许多新生代。所以委员会认为他获得这个卓越奖，实至名归。■

全球情绪劳动：

访谈Arlie Hochschild



Arlie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是享誉盛名的社会学家，其研究证明了深度理论和平易近人的论述是可以相互结合成为很好的社会作品。其 8 本书中，包括了 *Managed Heart* (1983),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Intimate Life: Notes from Home and Work* (2003), *The Outsourced Self* (2012), 和最近的 *So How's the Family? And Other Essays* (2013), 她检视了情绪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宏观和微观的社会互动。其源创性的概念像是“情绪管理”，“情绪劳动”，“感觉规则”等，都极其重要。你跟她谈话，就会发现她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社会议题的关注者。以下是葡萄牙的文化与社会研究院学者 Madalena d' Oliveira-Martins 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在 Berkeley 所作的访问。

MO: 你是 60 年代 Berkeley 的研究生，可以谈谈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怎么影响了你的社会学观点？

AH: 在 1962 年 10 月我刚到 Berkeley。古巴飞弹危机正要来临，而美苏冷战正火热进行着。Kennedy 总统和 Nikita Khrushchev 正在核武议题上相互威胁，一触即发。有一天我到校园的中央广场，看见一群学生、助教、教授等围成几个小群体，大概 10 个人、20 个人一群，激烈地讨论着某些事情，像是我们正在面临一场核武战争吗？和平运动可以怎么进行？等等。每个人都热情地讨论着，而我感觉，“对，这就是我想要的”。后来我想到这或许就是 Habermas 所谓的公共领域的理性言说。

不久之前，我走在同样的一个广场上，看到学生来来往往，每个人都在讲手机。他们都在讲话，不过不是跟身边的人讲话。我发现公共领域不见了。这些面对面的对话都到了网络上了。

>>

但是共同的目标和立即的感觉不见了。不论如何，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更多 60 年代的乐观主义，觉得世界可以改变。

MO: 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情绪劳动，也就是一种召唤或是压抑的心态，让自己有一种对于工作的正当感受。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

AH: 在社会中，随着服务业的发达，这个概念解释了许多工作的日常生活实在，像是保姆、托儿所、老人照顾、护士、老师、治疗师、收帐员、警察、劳工等，越来越少的工作像是砍树、凿井、制造等等。取而代之的是面对面的、声音对声音的互动，提供服务。那些互动称之为情绪技巧。

MO: 我在妳 Global Woman 的文章“Love and Gold”以及在 So How's the Family? 的“The Surrogates Womb”中，发现妳把情绪劳动的概念用在全世界各地了？

AH: 我一直在研究保姆和老人照顾，这些人从其他南方国家只身来北方国家，行成了保姆炼。我受到了 Rhacel Parrenas 研究的影响，也访问了在加州 Redwood 市的菲律宾保姆，她们也雇用保姆去照顾她们在母国的小孩，形成了另外的保姆炼。

MO: 妳把这个结果称之为“心的移植”(heart transplant)？

AH: 是，女性心的表达在此脉落一分为二。这个分化需要很强的情绪劳动。被移植的保姆要管理她的孤独和对于所照顾小孩的困惑情感，她们照顾其他人的小孩比自己的小孩时间还长，有些甚至没看到自己的小孩还有好几年了，因为她们的小孩在 Manila 或是 San Pedro Sula 或是 Michoacan 等南方城市。那些保姆费是用来给她自己小孩上学用的，可是小孩却可能不喜欢、讨厌、生气，甚至对自己的母亲感到疏离。

MO: 妳也写过关于印度代理孕母怎么把自己的子宫当作箱子的文章。

AH: 是，我所作过的访谈之中，最感人的是我在印度 Anand 访问商业代理孕母的案例。其中有个很贫穷的女性，为了生计当代理孕母，一次 3000-5000 美元，国内和国外都有

。从这些案例和社会学家 Amrita Pande 的研究中，我称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子宫出租服务业。为了生计，代理孕母必须学习管理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情绪，那这子宫到底是谁的？也要管理

对那个怀在度中的小孩子的情感，即使生出来后不会再看到，但是还是会记住。

保姆和代理孕母必须面对这种情感异化的挑战。19 世纪，马克思给了我们异化的震撼图像，那就是欧洲的工人。我则认为，21 世纪，这些被异化的人是来自全球南方的女性服务业工人。

MO: 妳也提出过“拟情地图”(empathy map) 的概念。德国社会学家 Gertrud Koch 把她的书“拟情之道”献给妳。什么是拟情地图？

AH: 那是一个被我们想象出来的社会空间，和其他社会空间区隔开来。我们对于空间内的人会给予理解和同情，但是边界外的人则否。两个群体内的人可以对各自群体内的人给予很大的理解和同情，可是两个群体之间却彼此敌对。若把这个地图展开，我们必须自己跨过界线，我对于这样的行动感到相当有兴趣。

MO: 在妳 1975 年的文章 The Sociology of Feelings and Emotions 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领域：情感社会学？

AH: 是，情感是社会学的核心。若我们是政治社会学者，我们必须去问政治信念后的情感，以及这些情感从哪里来。若我们是经济社会学者，我们必须去问经济信念后的情感，偏好背后的情感，甚至是股票市场的笑与泪。每个社会学的次领域中都有情感，那是核心，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精致地看待。

在 70 年代我在构思这个概念的时候，有几股潮流涌现。一个是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的概念正在变化，感觉和情感管理也在改变。有些时候女性必须改变，有些时候也可以透过正当化照顾改变办公室的文化。而服务业大量扩张，企业越来越大，新的情绪管理需要也要响应工作以外的关系，私领域的扩张，家庭生活的脆弱，旧的基础的减少，对于情感关系的需要等等。所有这些让我了解到我们必须发展一个概念来让我们可以更深刻了解社会生活的核心情感问题。

MO: 妳会担心像是心里学或是其他领域研究情绪的方法吗？

AH: 噢，那是当然的，我甚至担心我的导师：Erving Goffman。有一次我和他，以及其他几位学者在一辆车上，他那时候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教书，然后到加州来旅行。他对我说：“Arlie，这些在车子里的情感，我很好奇妳要怎么科学地进行研究？不可能吧。”他是很科学的人，但是对于人类心理看成是黑盒

>>

子，认为不可能谈论这种黑盒子内部的东西。可是他却也很深刻地给了我们很多有用的对于黑盒子内部的概念与理论。

MO: 同一篇文章里面，妳也说古典社会学忽略了“感受的自我”，认为研究情感要考虑个体的感知，这是说情感包含了评价思想的结果吗？情感来自评价性思想或是冲动？

AH: 我会说答案是两者都有。一方面，我认为情感是一种感知，像是视觉、听觉、触觉，婴儿就有了。但是生物学的故事到此为止。社会学则是从这里开始，去研究我们对于不同感觉如何理解、如何标签、如何赋予意义，如何回应。心理学家则不会说：“对，我们有眼睛，故事结束。”他们会研究人类怎么学习观看这个世界。

我有个机会访问到一个人，他这么描述在极地的寒冬中行走的经验：“身体被白雪包围，然后突然间看到一双黑色的眼睛，那是雪鸟，然后你就会继续寻找那一双黑色的眼睛，准备好要再看到，从此白雪对你来说变得不一样了。”而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我们准备后要去享受快乐或是愤怒。我们有期待状态，对感觉会有期待。

然后和我们期待感觉不同的是，我们也会有对于我们应该怎么感觉有所想法。“我应该对得奖感到高兴，或是我改对犯罪感到恐惧。”诸如此类的就是微观的感觉，我们透过此建造感觉地图和管理感觉。我们常常想象我们自己是自由的社会科学家，可是我们若是不好好地研究感觉与情绪，我们会有多自由？

MO: 在市场社会里面，我们创造了焦虑，也想解决焦虑，于是有了服务业。我们也持续寻找家庭价值或社会价值。那情绪，以及情绪的管理，是一种更好衡量界线的概念吗？认为心理力和经济力是互斥的吗？

AH: 我们常常用市场语言来描述我们的生活。“I buy that idea”，“I like her brand”，“He’s invested in you”。这些比喻隐藏着情感规则。我在 So How’s the Family 中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你的地理周遭帮你找朋友的服务。这是付费服务，就是付钱，然后帮你找到朋友，然后得到资产报酬 (ROI)。若你登入这个服务，你会知道其他人也正在找朋友。若我们把找朋友也当作是投资的话，那我想知道那样的情感规则影响了友情吗？在 The Outsourced Self 中，我试着去问市场和个人生活的界线在那？这特别是在个人服务业专业化、扩张、延伸到各个社会阶级的时候，特别重要。

什么时候我们会有情感警告，也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对自己的生活太疏离的时候？

MO: 可以谈谈下一个写作计划吗？

AH: 在 The Outsourced Self 我研究我们怎么在市场和个人的场域画界。而现在我转向一个不同的面向：政治和个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美国已经历了自由和保守派的对立。两边都有不同的道德地图，也依循着不同的情感规则。自由派对于无人机轰炸和 NSA 监控感到恐惧，而保守派对于政府过度管制和征税感到不安。所以我想跨出我的自由派舒适圈，去看看保守派的人们怎么感觉，去发现更多的情感规则，怎么影响他们和我们的信念。我也想要找到一条桥，跨越两者，然后一起到公共领域中想办法让社会更好。所以我持续倾听这个社会。■

来信寄给

Arlie Hochschild <ahochsch@berkeley.edu> 或 Madalena d’Oliveira-Martins <madalenaom@gmail.com>

> 印度制造 婴儿工厂

by Amrita Pand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South Africa and Ditte Maria Bjerg, Global Stories Productions, 丹麦



Amrita Pande庆祝印度代理孕母作为有权利的劳工，制造胚胎和婴儿。Morten Kjærgaard摄影。

“很好，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重要的戏剧表演，况且还是社会学博士和演员共同入境的。” Simon Andersen, “Smagsdommerne,” 丹麦国家电视台。

对于我在剧场和表演研究的同事来说，创意演出社会现象或许没什么，可是对于社会学家却很新奇。我们许多人是把创意带入教室里面，带入教科书的社会学想象。

所以 Global Stories Productions 的艺术导演家 Ditte Maria Bjerg 知道我

是印度商业代理孕母的专家时，便问我是否可以和她合作一场互动的剧场表演，就是以代理孕母为主题。她的前一部作品是以美国社会学家 Arlie Hochschild 的情绪劳动为题，也是由于 Arlie，我才会和 Ditte 搭上线。他的计划很简单，就是把代理孕母用艺术戏剧的

>>



回到田野，代理孕母帮Amrita Pande 做 Godh Bharai (baby shower)。Miriam

方式呈现出来，也需要我博士论文的田野经验。我之前的印度的表演者经验派上用场，摇身一变，从田野经验提供者成为了教育者和表演者。

所以这个跨学科的旅程就此展开了。两位艺术家和研究家开使用互动剧场的方式去表现代理孕母的议题。

我用社会学家 Amrtia 所谓的用创意重新解读自己的作品这种方式，以及创意艺术家 Ditte 所用的艺术家结合研究者的双重视角，发展出下列的故事？我在“印度制造”这部戏中，强调两个时间点：代理孕母所规划给 Amrita 的 Godh Bharai (印度 baby shower 仪式)，以及代理孕母的编织活动。一方面，这两个时间点可以

让我们和代理孕母被医学监控的“受规训的母职工人”角色之外的身份互动 (Pande 2010)，另外，这个经验也可以和世界上所有的观众分享，特别是多数不曾和印度代理孕母的观众。我们研究把两个时间点当作群体剧场。这里有两个群体：代理孕母和观众。这个互动剧场的目的是要去连结两个群体，然后可以质问自己、他人、以及关系。

> Godh Bharai (baby shower)

Ditte: 读了 Amrita 的田野之后，我马上了解到若要把这个故事转换成剧场演出，那我必须和 Amrita 去印度一趟。而我的团队、舞台设

计、摄影师等才可以制作场景，好让观众一起互动。也一方面好好观察社会学家 Amrita 和她的受访者。要怎么做其实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 Amrita 打电话给我，说：“Ditte…我们去印度的时候，我会是有身孕的。”

Amrita: Ditte 对我田野的介绍是关于我在印度生育医院和代理孕母中心的经验，我的田野分析都在我的书 *Wombs in Labor* 中可以找到。决定要再次回到田野是很紧张的。你从来没办法知道你的受访者是否会欢迎你，或是抱怨你错误诠释她们的人生。我回到田野的时机也很巧，因为我那时有6个月的身孕。我不太确定我

的怀孕会怎么被她们看待。我担心对她们不尊重的这些事情，在我和这些之前我的受访者联络上之后，都不见了。她们很开心的庆祝我这个天真（未婚）的研究者。而 Ditte 也把这个点纳入互动剧场之中。

当我到达代理孕母中心时，我看到许多旧识。有很多人做代理孕母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了。她们很热情地期待着 Godh Bharai。通常在怀孕第 7 个月的时候，她们就会被安排这个仪式。孕母可以被允许违反中心的规定一次，可以不用睡午觉一次等等。Jigna 是唯一一个上层卡司特的孕母，自愿当仪式的祭司。然后 Puja 成为艺术家。这是 6 年来我第一次在田野中看到孕母离开床上，载歌载舞，大声欢笑，不受约束。孕母要负责艺术团队喜欢与否。若是艺术家的介入可以达成，那我完全同意！随着歌声，其中一位孕母 Vaishali 小声的说：“唯一的不同是你们可以保有小孩。”

> 编织

Amrita: 所以在充满焦虑的代理孕母工作中，其实会发现道德一直是辩论的重点。代理孕母中心更是代表了 this 观点。“但是，一直讨论道德有什么用？这些贫穷的亚洲女性被迫贩卖子宫赚钱，然后呢？我们难道不需

要往前看，把这些女性看成工人，具有劳动权益？你说呢？”这是给欧洲观众所说的一段话，要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看看他们怎么从道德的观点转移到劳动者的观点。

Ditte: 其中一个给女性在代理孕母中心的“训练”活动就是编织。每个星期有两次，会有老师教导这些代理孕母如何编织一些像是花和叶子的图案。这个非常性别化的活动看起来很适合孕母，因为这不会伤害婴儿，不会让孕母去挑战规范，医疗人员，或是访看。但是，我们想出了另外的一个点子，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和她们一起编织，而是去编织另外的图案来代表孕母的工作内容呢？孕母会得到酬劳，而观众会得到真实的代理孕母工作象征，并且理解这些孕母其实就是劳工，是可以生产婴儿之外的东西的。这个计划是和著名的艺术家兼运动者 Mallika Sarabhai 和 SEWA（非正式女工的 NGO）一起构想的。我们的想出的图案包括注入胚胎、胚胎转移、卵子移除等等，还有其他会带来压力的东西，包括飞机、手机、辣椒等等。

印度制造的最后一幕是这些编织被呈现给观众，也就是在 Amrita 阐释了代理孕母作为一种劳动的概念，以及代理孕母作为具有劳动

权益的劳工的看法之后，呈现给观众。观众于是有机会亲自碰触到这些编织，然后取体会，每一个编织都代表了一位印度代理孕母的劳动过程。然后观众可以决定要问什么问题。

> 印度制造 - 巡回经验 (2013-2014)

印度制造在北欧的演出相当成功。2012 年秋天在 Stockholm 拉开了序幕。在瑞典巡回之后，2013 年开始在丹麦。印度制造只有巡演版本了。Amrita Pande 和 Ditte Maria Bjerg 想要在会议和节庆时表演，作为一种经验，展示艺术和学术如何结合、相互激荡。表演有两个小时，包括了 Amrita Pande 的问答时间，她在剧中扮演了许多不同的角色。■

来信给：Amrita Pande
<amritapande@gmail.com>.

更多信息到

www.globalstories.net

> 21世纪之交的

法国社会学

by Bruno Cousin, University of Lille 1, 法国, ISA区域和都市发展委员会委员, (RC21),
Didier Demazière, CNRS and Sciences Po, Paris, 法国

法国的社会学不论作为一个领域或是一门专业，还没有人从社会学的角度好好研究过。虽然哲学和经济学已经被许多社会学家分析过了 (Frédéric Lebaron 和 Marion Fourcade)，社会学的部份还没有人做过。

可是，我们却已经有须多单篇文章或传记讨论法国社会学。例如 Georges Friedmann 和 Georges Gurvitch 虽然在法国以外没人认识，可是却是战后法国社会学的重要人物，是衔接 Émile Durkheim, Marcel Mauss, Maurice Halbwachs 和新生代的社会学家。此外，有许多自传文章或历史，包括了 Raymond Aron, Georges Balandier, Luc Boltanski, Pierre Bourdieu, Michel Crozier, François Dubet, Henri Lefebvre, Henri Mendras, Edgar Morin,

Pierre Naville, Gérard Noiriel, Dominique Schnapper 等。此外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文章，或是系所及研究中心的档案资料，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描绘法国的社会学图像。

第一个主要的进步性转变是不同学派之间对立的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主题组织的建立。虽然学派奠基在理论典范以及领导学者和研究中心，特别是在 Paris，主题组织是共同研究议题的合作网络。例如今天的法国社会学就没有像是 70-90 年代被 Bourdieu-Touraine-Crozier-Boudon 的四人学派所主导一样（历史唯物论的衰落和结构主义的兴起）。这些学派科学的争议和敌对至今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可是新的理论也出现了，且广被国内和国际所接受 (1)。不过今天的社会学与其说是理论辩论，不如说是围绕在几

个大的领域上的知识版块重组：都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教育社会学、迁徙社会学等等。

这个专业化的改变是部份受到研究人员和教师数量增加的影响，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内。这个改导致了研究者要和其他人进一步去区别，于是强化主题领域的边界，每个领域都要有一定数量的成员去维持一定的自主性。此外，使用科学文献的便利性也开拓了领域，不过领域的边界也日益强化和分明，特别表现在为了要熟悉某个领域的知识而近一部和国际社群对话所日渐增加的机会成本上。像是要同时用法语和英语发表。

从过去 15 年来，许多有名的研究大学，包括 Sciences Po 和 EHESS 等，都寻求国际的注意和影响力，因此间接地让领域分

“There is no equivalent to the once dominant quadrumvirate Bourdieu-Touraine-Crozier-Boudon”

化越来越严重。同样地，法国社会学会（2002年成立）的组织也强化了领域分化性（2）。再者，主题专门化和法国学界鼓励的跨学科交流是相当符合的。École des Annales的最后一个计划就是去整合这些学科。最后，这个转变被许多寻求专家的制度所鼓励。

有三种角色是法国社会学所喜爱扮演的：研究型，政策顾问型，批判型。但是从21世纪开始，这起了变化。第一种角色被要求应该要走向国际比较。可是并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给研究型学者（Musselin 本期文章），此外，竞争的研究补助，官僚的管理模式，审查制度（Lebaron 本期文章）等，也削弱了社会学家个体或集体的自主性。

同时，社会学家作为政策顾问的角色并没有增加。虽然许多人在国家或地方的顾问团队、智库等工作，或是一些知识性工作，社会学家对政策的影响力其实很小。其专业性通常只是补充性的，主导

的还是专业的政策技术人员，主要从训练公务员的学校 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而来，对社会学其实不太重视。此外，经济学还是比较被重视的学科。不过在公领域若谈到社会问题，或是私领域的人力资源，社会学还是会被重视（Neyrat 本期文章）。

最后，社会学的批判面向，像是批判不平等、剥削、宰制、歧视、社会再生产，培力社会运动等，在这些年也变化不少。Pierre Bourdieu 在2002年过世之后，没有一个公认的批判知识分子出现。整个知识专门化的潮流其实就是在鼓励专门知识分子（Michel Foucault 所言），而其言论和分析都在报纸上、或是批判性期刊、小型文集中。此外，法国和其他地方一样，也越来越多反身性思考生产批判性知识为何日渐困难的原因，像是对于社会学的管制，或是国家学会拒绝采用行为规章（Pudal 本期文章）。■

来信寄给 Bruno Cousin <bruno.cousin@univ-lille1.fr> 和 Didier Demazière d.demaziere@csso.cnrs.fr

注1：例如，Luc Boltanski 和 Laurent Thévenot 的行动典范与批判能力的理论，以及 Bruno Latour 和 Michel Callon 的行动者网络，都广为被接受，称为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

注2：关于法国社会学会，请见 Cousin, B. and Demazière D. (2014) “L’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A Young and Rallying Organization,” European Sociologist 36, pp. 10-11: http://europeansociology.org/docs/Newsletter/ESA_Newsletter_Summer%202014.pdf

> 消失的 学术生涯

by Christine Musselin, Sciences Po, CSO-CNRS, Paris, 法国

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体系由三种不同的制度所形塑：提供博士学位的大学、国家研究单位，包括多学科的 CNRS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和专门给生物学的 INSERM 或是给农业的 INRA、以及训练工业、管理、经济精英的学校 grandes écoles。法国的社会科学家多数在大学里面任职，有些在 CNRS 里面，但是很少。而且这样的差距还在增加，学生越来越多，教职也增加。有些社会学也在专门的研究机构里面，但是很边缘，也通常不是社会科学研究 (1)。最后，还有人在工程或是商管学院里面，我们对于这方面的数据不多，但是他们其实也都在大学里面。

大学教职需要博士学位，而申请者必须被国家级的委员会所认可：CNU (Comité National des Universités)。这是为了让他们第一个职位是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MCF)。这个职位是终身职的。历史上，法国大学并没有所谓的“升等到终身职”。不过最近在 grandes écoles 有出现了。385 位社会学博士在 2013 年要求认可，可是 221 人通过而已。而通过的人和几年前通过的人一起要竞争 27 个社会学教职缺。

CNRS 所提供的缺很少，平均每年 5-6 个。整体而言，学术界能消化的博士可以说少之又少。2012 年，只有 6.5% 的通过认证博士有找到教职。MCF 的新进人员平均年龄则是 35 岁，57% 是女性。显然，许多通过认证者还是被拒绝在门外。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法国学术界还是偏好年轻的学者，像是那些有着直线的学历和刚毕业的博士。结果就是那些没办法马上进入学界的人就越来越不可能进去了。

一旦当了 MCF，每年的 192 小时教学时数紧跟着而来，许多地方还会被要求超终点。为了做研究，那些花时间的田野研究越来越难。在大城市像是 Paris 的生活开销大，而每月给 2500 欧元的薪水根本不够，所以很多人就超时工作，这让做研究更不可能。许多人一辈子就当 MCF，无法当教授。

升等到教授需要通过 habilitation à diriger des recherches，这是一种论文。升等也是要同过国家委员会的认可。这个通过率算高，2013 年 64 个申请者有 67% 通过。而进几年竞争并不激烈。2013 年 42 的通过者竞争 21 个职位。2012 年，30% 的新通过者成为教授，平均 47 岁，41% 是女性 (2)。

“Many ‘qualified’ PhDs are left standing at the doors of academe”

这样的低竞争显示出其实这条路还是有吸引力的，虽然说薪水不高。薪水从每月 2100 欧元到 6000 欧元不等。这个差距部份取决于年资，以及多快升到正教授。不括社会科学里面，升等通常较慢。

法国学术的环境在这几年因为学术治理的改变而变化很大。学术界仍然是公务员身份，但大学也被要求越来越多。从 2007 年，大学必须负责职员名单，让教师越来越像某个机构的雇员。同时评估的扩张，研究案为主的资金分配和经历为主的评量方式，让新进人员和老手之间的差距变大。这也增加了学科间的差距，让有些学科更可以达到这些评鉴目标。现在要说社会学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或许言之过早，不过未来几年内这些议题绝对会浮上台面。■

注 1：此外，和 CNRS（以及 INSERM）不同的是，专门的实验室不在大学之中，而 85% 的 CNRS 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单位都相当活跃。

注 2：数据都是由高等教育研究部所提供：<http://www.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pid24586/concours-emploi-et-carrieres.html> (May 9, 2014).

来信寄给 Christine Musselin <christine.musselin@sciencespo.fr>

> 评价法国社会学

by Frédéric Lebaron, 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 Saint-Quentin-en-Yvelines, 法国

法国社会学家就像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家一样，花了很多精力在审查别人的作品和响应评鉴。而法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组织，以及知识的惯习，让法国的评价活动有着不同的面貌。

> 博士的评量和指导研究的认可

法国的博士论文有着很特别的评量方法。论文本身通常很长，超过 300 页，有些甚至到 1000 页。这会被送到一个评鉴委员会去，通常有 5-6 个教授或是称之为 *enseignants-chercheurs* 的人所组成，这包括了你的指导教授。其中的 2 个人必须是校外的 (*rapporteurs*)，他们有权力停止论文答辩。若这两个教授认为论文可以通过，则委员会的每一个人，从指导教授开始，会在答辩的时候开始评论论文。他们会问问题，然后通常要 3 个小时。然后，委员决定要不要给予该博士生最高的荣誉 *félicitations du jury*，或是

très honorable，或是更低的等级。第一个等级需要委员一致的通过，是秘密投票。最后，委员会主席要写个很长的论文报告 (*rapport de thèse*)，作为总结全体的意见。这是很关键的报告。

所有的博士生都努力想得到 *félicitations du jury*，这当然重要，不过也很主观。有些学校取消了这些制度。社会学则越来越重视论文报告，因为那是对于论文质量的总体评价，还包括了各个委员的评语，以及该博士生得贡献。

> 学术生产的评鉴 (文章、书籍、报告)

过去几年来，期刊文章的审查有了重大的改变。所谓的常态化评量出现了，就是要与国际标准接轨，包括匿名审查，至少两位审查人。合理的交件时间。这些改变是由于各个阶段所面临的压力所导致。

英文出版还是很少

见，不过这成为了核心评价标准，这也影响了期刊。有些法文期刊选择了部份文章翻译成英文，是为了要去增加能见度，让那些文章代表法国社会学。

法国研究和高等教育评鉴中心 (AERES) 指出了一个期刊表，这些期刊有多种语言，代表每个领域的顶尖期刊。当然，人们对于什么是好期刊仍有主观的评价，所以这个列表还是有争议，像是到底不属于社会学，到底好不好等等。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出版书籍还是很重要。论文会出版成书，然后书籍通常是学术辩论和教学的焦点。

> 生涯与制度

学术位置是奠基在特别为委员会的评鉴上。遴选委员会是属于各个大学的，而国家委员会是决定是否授予教师资格的单位。博士论文和论文报告在整个过程中是很中要的

“The indicators we use are largely insufficient”

文件。然而，论文发表更为重要。此外，教学和学术服务也是。

在此要区别两个制度，一个是现在 CNRS 或是类似组织所采用的评鉴方式，这取决于当事人是 maître de conference 或是教授。另外一个升等评鉴。在两者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家委员会组成了代表，实施评鉴。然后遴选方式、期刊发表等的辩论也因此产生。

在大学的评鉴里面，大学国家委员会 (National Council of Universities) 已经历了许多专业冲突。虽然这似乎是可接受的评鉴方式，但不是所有的社会学家都认为有必要去建立一个经验研究的最低符合标准或是出版的质量。此外，许多社会学家拒绝标准化、以参考书目为主的评量方式，评鉴标准因此是个复杂的议题，需要多元意见的纳入和讨论。因此有必

要继续辩论，包括教学、研究、出版、学术服务、以及其他的责任。当然，各种方式都要考虑，不能有统一的办法。

最后，研究中心或是实验室事由 AERES 的评量，并且主要以出版纪录为主。其他的标准包括了：内部运作、管理、知识活跃性等等。不像其他国家，法国没有国家及的排名系统，政府的排名是以学生的专业就业违者。所以，最相关的是硕士学程。

➤ 更多元和整合的评鉴

法国社会学得未来发展若是要丰富且有创意，那就必须要有多元的研究和出版质量，并且要传散的世界各地。这必须要拒绝英语出版的霸权，因为那会影响在地的特殊性。此外，我们也要拒绝用引用书籍当成简化的评鉴标准。许多精致的评鉴必须

发展出来，然后掌握社会学知识的独特性。最后，要拒绝各种形式的学阀、学派、还有学术传统。

更重要的，要保护学者用自己的母语出版。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要增加没错，但是要让知识的传散更加平等。

另外，对于评鉴方式的讨论也很重要。质量才是关键，量化评鉴指标并不够。虽然这些必须考虑，他们也被需被更好的评鉴和诠释。还有，学术服务的贡献，民主治理的质量，学术生涯与工作环境等也很重要，这对于新进社会学家来说特别如此。■

> 变迁中的法国社会学专业

by Frédéric Neyrat, Université de Limoges, 法国

从1960年开始，法国社会学开始变成的专业前景的实验对象。高等教育扩张让社会学学生人数增加前有未有的快，可是这个相对新的学科其实在一开始是透过录用中学教师所组成的。的确，50年前，社会学并没有出现在中学课程里面，可是即使在经济学出现之后，以及录用教师的考试变得很竞争后，社会学在大学里面还是很少见。

此外，当时大家也质疑社会学的出路。社会学其实是被政治所影响的，像是1968的5月运动者很多就是社会学家。那些跟随Raymond Aron的人(The Elusive Revolution: Anatomy of a Student Revolt, Praeger, 1969)会同意5月革命是集体亢奋，把运动归因给社会学的出路是黯淡的。这样的论述有了新的版本。社会学成为是人文社会学生失业的象征，所以法国资格研究中心(CEREQ)建议这可以被看成是从硕士毕业或是拿到证照的毕业生所共同会经历的事情。

然而，社会学博士的就业是最有趣的事情。或是说，专业的社会学可以提供我们了解这个科系怎么运作。最明显的例子是enseignant-chercheurs或

是教师研究者，此外在公立机构的研究员也是。无疑地，社会学作为学科是受惠于高等教育的扩张的。在1984和2010年之间，教师研究者的工作增加快速，远比其他科系快。社会学整体是302%，所有学科的平均则是213%。可是，最近的增加速度减缓了，其他科系也是。整体来说，法国社会学是在下滑。大学职位减少。5年内，职位会减少25%，会从2000减少到1500个。同样的，CNRS会从400减少到300个。

同时，工作的不确定行也增加了，这在研究和教学单会都是如此。有更多比例的公共研究是由计划去分配资金的，也就是透过法国的国科会(ANR)。博士后的职位也有，但是不确定。此外，大学也开始减少聘用终身教师。当LRU法在2007年通过时，大学可以聘用临时教师，确保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可以持续。的确，法国的公立大学有自主行，这是当国家暂时不给予资金时，这就是Thomas Piketty最近的文章所要说的(“Faillite silencieuse à l’université,” Libération, November 18, 2013)。结果就是几乎有4分之1的大学，包括了世界级的中心，都破产了，而且雇用越来越多的临时教师。

“Almost one fourth of universities are on the brink of bankruptcy”

很幸运的是，社会学的未来不会被限制在学院里面。许多研究公司和顾问公司都会使用社会学的人才，过去数年间也有了许多的工作机会被创造出来。像是在都市和规划的前导研究通常是跨领域的团队在执行。按照不同计划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会担任不同的角色。这在都市更新计划中特别是如此，还有在那些特别都市区域也是。计划管理者需要影响评估报告，所以需要社会学家的专业。

另外一个研究公司和顾问的市场就是公共政策评估。例如，健康保险就是社会学家常常可以派上用场的地方。同样地，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社会政策等也是常见需要被评估的领域。最后，企业也通常会需要以下的研究：社会心理风险(压力、骚扰、自杀等)，工作组织(重组、缩编、评量、再置等)，性别平等、歧视等。

社会学家并不只是那些研究或是顾问就业市场上的人。研究通常都是跨学科的。此外，社会学和其他的专业者是有竞争关系的，因为其他人也可能会称自己是社会学家。在法国，社会学家不一定念过社会学。可是，专业化的上升

带为社会学家的头衔带来了一些保证。例如，一个系所的成立会要求某些专业领域的人来研究或教书。同时会质化和量化的人是比较受到重视的，大家也会想录用，可是另外一方面具有专业的人才也很抢手(都市、健康、政策等等)。

有些社会学博士在研究公司工作，也已经放弃学术生涯了，因为就业市场并不好。然而，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关系。有些教授和研究员支持这些公司，并且参与其中。相似地，在研究公司工作的社会学家或许也会到大学教书。

最后，社会学家并不单单只有那些有在教社会学或是做社会学研究的人而已。那些读过社会学并把社会学观点带到其他领域的人也算是社会学家。只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那些数据。■

来信寄给：

Frédéric Neyrat frederic.<neyrat@unilim.fr>

> 为什么法国社会学没有人类受试者规范？

by Romain Pudel, CNRS (CURAPP-ESS), Amiens, 法国

不像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学会，法国社会学学会 (AFS) 在 2011 年决定不采用受试者规范。这个决定经过了数年的辩论，AFS 成立的许多工作小组，参考审阅其他国家既有的规范条文，特别是北美，后制定出一个草稿。

法国社会学是否要采用伦理规范或是受试者保护协议的这个问题，是首先被那些在私人企业、公部门工作的社会学家所提出的，那些都不是学术组织。伦理规范的草稿是建立在其他社会学组织、顾问、健康专业或实验科学家的规范基础之上的。

辩论进行得如火如荼，包括在 2009 年，Michael Burawoy 在第三届于巴黎举行的 AFS 大会上做了一场演讲，说明他的研究 *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 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a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2)。他说，这个研究种族歧视的研究若被要求一切都公开透明，那就进行不下去了。Burawoy 的论点强化了反对规范社会学研究的人的看法。

两年后，最终计划版本提出了，并在第四届 AFS 大会上报告 (<http://www.afs-socio.fr/sites/default/files/congres09/FormCharte.html>)。这个计划有两个部份，第一个是许多人支持的所谓“最佳研究执行”，包括研究生和指导教授的权利和义务，抄袭的禁止、

教学或研究工作上的剥削、骚扰等。然而，许多人对于解决争端的机制的有效性提出很大的质疑，像是：有必要成立一个社会学的委员会去处理吗？正当性在那？会是怎么回事？其手段为何？谁来执行？AFS 有权力仲裁吗？这些问题显示了社会学家的质疑，即使规范订定了，谁来执行仍大有问题。

这个计划的第二部份：社会科学的最好研究方法，是被批评得最严重的。特别是在下面这段文字：

社会学家有责任清楚向那些参与研究的人解释研究的内容。为了要完全理解为什么加入研究，当事人必须被告知：研究主题、目标、研究负责人、执行者、赞助者、结果的公开方式。社会学家不能在当事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利用工具，像是录音机、录像机等。当他们被研究者纪录时，他们要被告知原因。

那些支持这些规范的人说这是从医学、生物、心理学而来的好规范。此外，他们也要求社会科学要有更透明的研究过程去保护人类，特别是信息的运用和数据收集。很显然这引发了很大的争论，这些政论被收录到 Sylvain Laurens 和 Frédéric Neyrat 编辑的 *Enquête : de quel droit ? Menaces sur l'enquête en sciences sociales* (Éditions du Croquant, 2010)。

“Freedom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was reaffirmed”

那些反对采用规范的人聚焦在“covert research”，也就是那些参与者并不全然知道自己正在被研究者或社会学家研究。很多有名的社会科学家就是这种研究，像是 Michael Burawoy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另外像是 Donald Roy 对于工厂的研究，Paul Willis 的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或是 Laud Humphreys 的“tearooming”。许多人认为这种研究应该持续，不该受限，可是若是 IRB 的委员没有社会学家，那就惨了。社会学家的自由应该受到保障，也透过同侪审查来鉴定研究质量，包括方法、理论、伦理等。这些对社会学都是很基本的。

总之，这些问题被提出了，答案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有了这些规范，我们还有可能可以去执行制度歧视的相关研究吗？可以研究贪污吗？可以研究经济学或是新闻学吗？可以研究政治台面下的权力运作吗？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有争辩，上述的讨论被保留在规范之中，也让法国社会学家产生了很大的敌意。所有人都同意伦理的问题应该被提出讨论，可是 AFS 若有权力因伦理考虑而阻止了研究，这是被社会学家认为是政治干涉，会让社会学面临困境。

因此，规范被拒绝了。社会学研究的自由被再次肯定。法国社会学家提醒了彼此，就是我们的工作一部分是去揭露各种不平等和宰制的形式，以及研究在出版之前要通过这个社群的同侪审查来确保学术质量。■

来信寄给：
Romain Pudal romain. < pudal@free.fr >

> 社会学在那？

环境变迁和社会科学

by Stewart Lockie, James Cook University, 澳洲, ISA环境与社会委员会会长(RC24)

社会学被低估的参与环境变迁的能力。
Arbu绘。

社 会学家时常抱怨社会学没有对环境研究和治理贡献些什么，政策制定过程中总是被自然科学家所主导，以及被人征询的时候，总是那些枝微末节的问题，像是社会影响、执行障碍等等。甚至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社会科学家，像是生物学家或是工程师，去把他们的系统机械观点普及化。

我们怎么解释这个对于社会学的忽略呢？学科的傲慢或许可以解释一部份，可是社会学所关心的权力、不平等、民主等概念或许更适合。到底社会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扮演多少角色？社会学的知识呢？以及那些观众呢？

按照国际社会学委员会（ISSC）的说法，答案是一点点。每三年，ISSC会出版最新的报告，讨论社会科学面临的诸多挑战。2013年的世界社会科



学报告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 总结了各种社会科学学科和全球环境变迁的关系，并制作了一个议程，好让社会科学可以对于环境变化的议题做出贡献 (1)。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 包括了以学科为主的各个组织，包括了 ISA、国际人类环境变迁组织等等。表面上，这是个多元的议程。可是，当触及到很深的政治与经济危机时，这个议程并无法让社会科学感到兴趣。

这份报告使用了文献分析的方式指出了社会学在整个环境研究中是缺席的。他们在 Thompson Reuters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搜寻那些包括“气候变迁”、“气候政策”、“环境变迁”、“永续发展”、“生物多样性”等关键词的文章，然后得出结论认为，虽然总体文章有增加，可是还是相对少数。

我相信文献新可以系统性的了解社会学家作为研究者、老师、公民等做了什么事情。若我们很快看一下 ISA 的研究委员会就可以知道社会学其实做了很多关于环境的事情，也很多人在跨学科的环境期刊扮演重要角色，像是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Local Environment。此外，许多跨学科的实验、研究等，特别是在全球南方，他们其实都没有被纳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这或许是 ISA 的环

境社会研究委员会在新出版的期刊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所可以处理的议题。

可是，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 也提供了我们思考如何扩大社会科学影响力的契机。这些改变的契机，意味着我们要回答许多永续和平等环境转型的问题，像是：

1. 历史和脉络的复杂性：当代全球环境变化过程怎么被政治经济所影响？他们怎么和其他的社会过程，像是战争和迁徙有关系？环境变迁的经验怎么因时空、阶级、性别、族群、信仰而有所不同？

2. 结果：全球环境变迁怎么影响人类？这些后果如何扩散？人们怎么响应？条件和变迁的可能：什么促进的个人和集体的变迁？折么是社会变迁、政策介入、民主程序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怎么凝聚共识做出贡献？

3. 主观的意义诠释：人们怎么理解环境变迁？社会学习的前景？什么是隐藏在人们选择和行动背后的预设？相反的，什么让人们产生冷敢、怀疑、甚至反抗？

4. 责任：Responsibilities：谁应该承担环境变迁的成本？怎么帮助弱势？

5. 治理和决策：决策如何面对不确定性？不同的环境变迁的框架怎么达成政治共识？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让政策制定者

科学家对话得更好。

这里的目标是去不是发展出一个中间的议程，让政策相关的社会科学可以贡献，而是要让社会科学更好、更大、更强、更不同。社会科学可以做的包括了充新确定环境变迁作为社会过程，影响政策和参与问题解决，知识上响应全球环境变迁，以及社会科学在实践时的反身性 (2)。

这不是什么没有理论反思和创造的视野，而是一个响应社会巨大变迁的框架概念。许多社会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已经正在做这件事情了，就像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 和其他例子所显示的一样。Karen O'Brien 就倡议对于环境变迁有更深的体会，整合地球系统科学，纳入人类非线性和反身性的复杂能动理解。(3)。John Urry 研究反身消费行为的可能性，刺激更多的创意和转变物质和能量使用的强度 (4)。光谱的另一端，Alberto Martinelli 提出的全球治理的模型，其中民主国家、超国家组织、责任企业、NGO 等一起合作形成一个研究的社群，并确保民主的决策 (5)。许多其他学者也关心合作式学习对于环境和社会正义的影响 (6)。

这些例子和我说的“自我相关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理论之间是要有对话关系

的。用很深奥的语言和复杂的术语总是隐藏了很多预设。若要超越自我相关社会学，我们需要把手弄脏，也就是说要去和别人合作，一起创造知识，为社会变迁做出贡献。这不是什么伦理问题，而是有效性问题。若社会学研究目的之一是去了解社会和环境的转变，多重学科整合或合作在认识上是必要的。

如何有意义的参与社会 and 环境的变迁并非总是有很清楚的答案。有些方式会有专业 and 个人的风险。有些并不可行，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 列出了一些已经采用的方式，包括了 Future Earth 是一个 10 年的 ISSC、ICSU（国际科学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Belmont Group 等其他组织的联合方案。我很强管例每个对于全球环境变迁有兴趣的人可以订阅 Future Earth 的刊物，考虑如何参与某些活动。像是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 所说的，了解合作的可能，像是 Future Earth 这样，是需要社会科学家去质问权

力、不平等、民主等的问题的。我或许不同意社会学家缺席的说法，但是我同意社会学家可以做得更好。■

来信寄给：Stewart Lockie <stewart.lockie@jcu.edu.au>

注 2：这些首先被提出：Hackmann, H. and St. Clair, A. (2012) Transformative Cornerstone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or Global Chang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Paris. 可见 http://www.igfagcr.org/images/pdf/issc_transformative_cornerstones_report.pdf

注 3：见 Moser, Hackmann and Caillods, Chapter 2,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changes everything: Key messages and recommendations.”

注 4：例子可见 Lockie, S., Sonnenfeld, D. and Fisher, D. (eds) (2014)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Routledge, London.

注 5：Chapter 4, “What’s the problem? Putt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nto perspective.”

注 6：Chapter 53, “Are increas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evitable?”

注 7：Chapter 83, “Global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注 8：例如，J. David Tabara (Chapter 11, “A new vision of open knowledge systems for sustainability: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scientists”), Witchuda Srang-iam (Chapter 76, “Social learning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Thailand), and Godwin Odok (Chapter 79, “The need for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n Nigeria”).

注 9： <http://www.futureearth.info/> and <http://www.icsu.org/future-earth/>

铜、水、土地：

秘鲁Piedra Alta的矿业

by Sandra Portocarrer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 Lima, 秘鲁



秘鲁原住民抗议：不要采矿、受够小偷和污染了！

秘鲁最近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成长，像是GDP，低通胀，低债，稳定利率。按照IMF的资料，秘鲁是崛起的新星，是个强韧的新兴市场。

不过，何时以及为何这个国家从一个农业国变成政治经济的新兴市场呢？秘鲁有世界第二大的铜矿量，所以矿业对秘鲁来说很重要。这可以吸引许多国外投资。秘鲁的GDP成长率是预期在2014年底可到5.3%。这个成长是可说是很稳定，且在14-17年会有平均5%的成长。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低成长的威胁居然是社会上对于采矿的反应，若是矿业被耽搁了，企业信心会下降，在下个10年会威胁减少到534亿美元。

过去6个月，我已经成为秘鲁第二大铜矿公司的社会学家。Tacna这间公司是由墨西哥人所经营，在60年代建立的。我住在一个矿区，大学距离市中心要2个小时的车程。我的公寓很舒服，有冷气、热水、网络、电视等等，还可以有温水游泳池，

有高尔夫球场，网球场、健身房、娱乐设施，可是那些矿工不能有这些设备，只有管理阶层可以使用。

我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十二小时。这是一个被秘鲁认为是摆脱贫穷的工业。我的工作让我可以到直接和间接的地方去，所谓直接影响的方式那些采矿区，环境直接被活动和计划所影响。而间接影响地区在采矿区之外。

我的工作让我可以对于采矿有第一手的认识。这个产业并没有平均对于所有人有影响。一个问题是贫穷小区怎么响应这个巨大的经济产业变迁呢？而这个Piedra Alta地区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迁徙重置居民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隐藏面向。秘鲁南面缺水的地区已经让上千户农业家庭迁到有水耕作的地区，但是通常是违法的。Piedra Alta就是这样的地方。

2001年，抗议者在和警察冲突几次后，600多名农业家庭占领了国有土地约10000

>>

亩，希望可以有水。这些 Piedra Alta 家庭从 Tacna 高地来，也从 Arequipa, Cusco, Moquegua, Puno 等地而来。

一开始，许多家庭是为了农业需要而占领这些地区的，因为他们一个月要耕作 3 次。到 Piedra Alta 可能需要 5 天，而因为警察要驱离他们，那些农户就决定要长期待下来。在访谈中，许多居民描述这块土地是因为他们的创业头脑而来了，他们不仅仅使用水，还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而占领那土地之后，这些农户建造了 6 哩的渠道，可以每秒让 1000 公升的水流过。但是健康部门担心这些水的质量。

讽刺的是，水坝其实是矿业的必需品，而如今却成了这些农民的生存方式。在试过许多农作物后，失败了很多次，Piedra Alta 的居民已经是种植牛至的专家，占了 70% 的土地。

这个农业的成功也伴随着合法化。复杂的法律让合法化过程历经了 10 年的时间。2013 年 10 月，Cerro Colorado 是 Piedra Alta 的一个省，宣布成 Piedra Alta 的一个政府区域。这意味着小区可以合法的生活在那。

而最大的挑战仍然存在。矿业公司将

会扩张，加倍产量，用更多的水。政府的环境评估说矿业不会用到更多的水，水还会被回收。这对环境抗议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可是对于 Piedra Alta 的居民而言却不是。回收的水会不会有问题？而秘鲁政府现在把相关的问题都推给矿业公司。其实许多的社会抗争都和水有关。再者，污染在这个地区是很严重的，让农民失去耕作信心。对他们来说，什么保证也没有。



来信寄给：Sandra Portocarrero <svnp86@gmail.com>

国际化和审查文化： 捷克社会学的例子

by Martin Hájek, Charles University, 捷克



Jiří Musil (1928-2012) 在捷克第一任总统 T.G. Masaryk 的像前说话。

审查文化和对于竞争的重视影响了大学和科学制度，在很多国家都是如此，捷克是最好的例子。其对于学术、科学、发表的影响，有许多文章探讨过(1)。可是，审查文化对于社会学相对小的社群的影响，却是一个被忽略的议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相对边缘，而是影响往往不是立即，也且往往很复杂。审查可以有好的和坏的影响，好的来说，审查可以鼓励科学家参与国际社群，不会被限制在国内。坏的方面，这些过程可能会低估了地方学术社群的重要性。两者之间有张力，并各有支持和反对者。捷克就是如此。

在捷克这样小的国家里面，其实只有1000万人，支持严格审查和竞争的人总是宣称只有国际社群可以决定什么是好的社会学。为了这个需要，在地的社群往往只有几百个人，容以变成几个小团体，相互竞争资源。他们也宣称这种情况让同侪审查更为复杂，因为只不过是再

生产了权力结构和学科划分，无助于知识的增长。

相反地，反对国际化和标准化的人强调在地脉络的重要性，认为国际发表和审查只是让国际的议题有利，遏止了在地议题的对话。他们也宣称，若在地议题需要国际化，然后被翻译成国际可认可的文章，这过程往往牺牲了在地文化的意义以及扭曲了现象本身。这对于自然科学可能是可行的，或许有些例外，不过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行不通的。

这些争辩，其实两方有一个对的共通点，那就是提升研究质量。大的科学社群中，其使用的语言往往只有一种，所以平衡模式是可行的，因为在地和全球的社会学是彼此交织的。但是在小的社群里面，语言可能是少数人在用的，那么推动国际化可能就有反效果，让本土语言不再是沟通的工具。为什么？因为作者要写两种语言的文章。以捷克为例，捷克文只被说捷克语的人阅读，所以其影响力只是

>>



Miloslav Petrušek (1936-2012)是著名的捷克社会学家，注重在地议题。

在地性的。而在英文文章里面，作者必须对国际读者的胃口，相对的捷克人就会兴趣缺缺。这产生了两种写作模式，一种是在地导向，另一种国际导向。虽然问题可以被看成翻译问题，可是并不是。因为这牵涉的研究议题的选择和发表策略的选择。

我假设有些读者看到以上的说法会摇摇头，说「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啦，以前就是这样，双轨制，国际和在地都有」。我同意，可是呢，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似乎只是个人学术生涯选择的问题。举例而言，Miloslav Petrušek (1936-2012)是一位捷克社会学家，也是一位本土导向的社会学家。虽然他对于国际上的社会学潮流很熟，多语并行，但是他只用捷克文发表文章，有时候用波兰文和俄文。他的学术

对于捷克影响很大，也影响了大众对于捷克社会学的认识和地位。而另外，Jiří Musil (1928-2012)是一位国际有名的都市社会学家，对于国际上的影响远大于本土，是1998-2001的欧洲社会学会会长(2)。

可是这种所谓个人选择的情况早已改变。审查和竞争的文化只对于国际化有利。所有本土的辩论都被认为是次等的。而本土的社会学家往往拿不到经费，也连带影响到了生涯。因此，在捷克要写一本好的教科书是很荒谬的行为，因为对于学术声望无助，也和国际化相反。结果，捷克学生从国外的社会学家，像是Giddens的教科书学习，那教科书强调美国和英国。这些社会变成了典范去理解在地社会的运作。新的社会学术语往往透过翻译介绍的在地社群，而翻译者往往不是学者。在地的公众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当今的社会。

审查和竞争的文化让国际导向的学者比较有利，若是科学质量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判对，那么许多学者只会着重在发表英文著作。的确也有许多年轻有为的学者这么做，最好的都发表在英文期刊。

我不是在倡议在地社会学比较好。在许多例子中，可能几乎了，就是在地社会学表现其实一般。

可是，这是在地社群知识沟通和教育的唯一方式。而现今的国际化导向，让在地发表变成只是发表分析结果，而不是科学实做。全球导向社会学家认为国际社会超越地方，会让大家认为地方社会只是国际社会的例子而已。■

来信寄给：

Martin Hájek <hajek@fsv.cuni.cz>

岌岌可危的社会学：

捷克经验

by Filip Vostal, Charles University and Academy of Sciences, 捷克



社会学受束缚，不过还可以行走。

岌岌可危是用来描述一个不安全、不稳定、不够力的情况。这也清楚的掌握了当代社会学的特征。首先，社会学之所以岌岌可危，代表着科技的重新在定义社会学的知识。再者，新自由主义年代中学院的变化让社会学变得岌岌可危。还有，岌岌可危也可以用来描述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当国际上关注到了社会学的特征，但是地方的紧张情势可能被忽略了。这篇文章就是要从捷克的脉落来讨论全球发展。

让我们从社会学的内部面向开始吧。无疑地，21世纪社会学将有新的数据收集方式和方法，而对于科技，社会学也会有新的响应。传统的经验方法（调查和访问）已经被又新又快数据所挑战。像是巨量数据，社群媒体等等，这些不但挑战方法本身，还挑战理论。我们可以把所谓「社会的」看成是一个包括各种目的类别的总

和吗？我们应该同时理论化生物的个体和科技的个体吗？为了宗教或是世俗？为了整体世界或是个别社会？社会学现在关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例外状态，动态和变动的网络。而传统的类别像是阶级、性别、民族、族群等，社会理论最近关注突出现、意外、风险等等。传统而言，社会学需要时空的距离去进行研究，但是有些当代理论反应、体现、甚至拥抱更广的新世纪社会生活，像是液态、混乱、速度。

岌岌可危的社会学有时候像是一种介于科技和传统之间的社会实做的冲突。有些模态（经验或是理论）是反抗可挑战的。例如社会学的地方镶嵌性，这就是一种不断被个人知识路径和各国社会学历史所结构的场域。Michael Saward说，慢理论包括了紧密的思考和审慎的态度去看待文化的特殊性，思考脉络性和价值、解释不同的意见与判断，拥抱脉络知识的生产。脉络化、慢的、民族志等的知识和科技化的、快的知识相差很大。捷克社会学就像其他的社会学一样，会在这两者之间摆荡，在地方的特殊性、历史发展，和全球化、科技发展两边来回徘徊。

但是或许最不安的是来自于外部的再生产情境。市场教条主义，商品化、企业管理等等，让学术困难的行走着。这些也让许多学术人员困扰，且影响不一致，增加压力、负担，不安。人人都发现时间压缩所造成的压力和对批判性思考所造成的影响。美国是一个天然的实验室，看看新自由主义怎么影响学术结构，但是这个潮流已经加速了许多学术企业化的脚步，捷克就是如此。

可是当我和英国的社会学家谈话时，英国和捷克很不一样。几个面向上，包括劳动条件、阅读写作研究的时间、空间等等。的确，虽然我们看到很多讨厌的词，像是卓越、创新、竞争力、知识经济等，捷克的学术环境和美国英国校园小说 Fight for Your Long Day 或 Crump 所描绘的场景大不相同。尽管新自由主义模式被捷克的政治所采纳，尽管学术也一直被限缩、商品化、市场化，捷克学术界仍然抵抗商业意识型态的侵略。奥国哲学家 Konrad P. Liessmann 对于学术商品化的批判广被捷克学术所采纳。而历史学家 Howard Hotson 对于英国学术改革的批评也被捷克学术界所认同。所以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潮流在中欧或许碰了壁。

即使有地方性的反抗，新自由主义还是可能影响了社会学家。可是这些压力是在新世纪社会生活已经变得很复杂和分化的脉络下所产生的，那要求新的理论、严谨的分析所谓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如何在地方发生，而地方议题如何全球化。现在我们需要一种可以描述、解释、改变这种现代性的社会学。

第三种的岌岌可危或许帮助了社会学去面对挑战。不断的发问、挑战社会现实，仍然是不论诠释或解释的社会学的核心。此外，社会现象、过程、文化、制度、关系仍然不是自然的，是需要被解释的。捷克社会学家 Miloslav Petrussek (1936-2012) 特别关注文化、艺术、社会学之间连结，认为文学也可以用来理解社

会。社会学仍然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包括了人文和文学。可是同时社会学也是一种常态科学，有典范和制度。这种双重性和不稳定性一直是社会学的独特的地方。



来信寄给：Filip Vostal
<filip.vostal@gmail.com>

全球对话的 阿拉伯团队

by Mounir Saidani, El Manar University, 突尼西亚

2011年2月底，Sari Hanafi 写 email 问我是否可以帮忙找全球对话的阿拉伯翻译。我把这个看作是突尼西亚革命的好成果之一，发生在 Zein Al-Dine Ben Ali 倒台后的几周。但我其实也在考虑自己的英文是否好到可以独自胜任这个工作。然而我也找不到翻译，遂决定自己亲自来做，不过我是翻译法文，而非英文。不过在接下来的一期，也就是3个月后，我开始翻译英文，我以前就有过经验，这次还有 Sari 的帮忙。在我 Facebook 上，我把阿拉伯的版本跟阿拉伯的社会学家公布，而我的英文也越来越好，对社会学的知识也更加渴望，并透过这样的工作让我跟全世界接触。总之我从中学到很多。在2013年的Ankara国家学会会议有幸可以和其他的翻译者见面，也让我对这份工作倍感荣耀。此外，这也促使我用英文发表我的作品，我想这是另外一项意外的收获。■

来信寄给

Mounir Saidani <mounisai@yahoo.fr>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Mounir Saidani 从2012年开始是突尼西亚 El Manar University 的 High Institute of Human Sciences 社会学系副教授。从2000年到2012他在 University of Sfax 教书。更早之前是中学的法语老师，教了18年。他的研究兴趣和发表围绕在文化、艺术、知识等的社会变迁。其用阿拉伯文发表了7本书。他也是 High Institute of Human Sciences working on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的多学科研究室的成员。



Sari Hanafi 是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的教授，也是阿拉伯语期刊 Idafat: the Arab Journal of Sociology. 的编辑。在2014年的横滨 ISA 世界大会他是国家学会的副会长。此外，他也是阿拉伯社会科学会议的成员。他的著作包括了期刊和书籍篇章，主题是巴勒斯坦的离散经验和难民、迁移社会学、科学研究的政治、公民社会、精英转型、转型正义等。书籍包括了 UNRWA and Palestinian Refugees: From Relief and Works to Human Development (共同编辑 L. Takkenberg and L. Hilal, 2014); The Power of Inclusive Exclusion: Anatomy of Israeli Rule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共同编辑 A. Ophir and M. Givoni, 2009, 英文与阿拉伯文)。即将出版的书是 Arab Research and Knowledge Society: The Impossible Promise (共同作者 Rigas Arvanitis)。